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理论界定及其发展前景

朱进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尽管其每个阶段的理论主张各不相同,但理论实质都是一种被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贯穿始终的西方左翼社会思潮。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的最新阶段,由于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且理论缺乏改变社会的现实力量,因而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崛起并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复归的大背景下,其必然不能正确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解放。

关键词: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13-06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在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危机时,转而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分析框架研究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其产生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双重逻辑的必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三种理论在内的理论流派。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西方,从19世纪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西方政治舞台,并于20世纪中下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达到了理论巅峰。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产生了众多流派,成果丰硕,这其中便包括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经济复兴时期,虽然经济

发展迅速,但始终无法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因此,社会上涌现出多种为实现具体目标而开展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社会运动”。在“新社会运动”中,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左翼学生运动最令人瞩目,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寻求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力求消灭性别歧视的热情。众多女权主义者积极参加“新左派”运动,却逐渐发现“新左派”具有浓厚的大男子主义氛围,女性根本无法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自此女性开始了新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便是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后来迅速波及西欧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其中,部分女权主义者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为分析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玛格丽特·本斯顿、达拉·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她们从女性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妇女受到的压迫,并把关注点放在家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在本斯顿看来,男性通过剥削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方式来限制其经济地位的上升,因而其认为女性解放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第二,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1]46}。而科斯塔和詹姆斯则在继承本斯顿的无偿家务劳动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她们把女性的家务劳动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之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提供使用价值,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向女性的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微薄的工资来间接占有妇女所提供的剩余价值,进而实现对妇女的剥削。因而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应该实行家务劳动计酬策略。

随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发现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阶级分析而忽视社会性别分析,且其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公共领域中不同性别人群占据不同的位置以及在私人领域中女性屈从于男性的现象。为了更全面地解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在1970年代中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相结合用于解释妇女受压迫根源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海蒂·哈特曼、齐拉·爱森斯坦、南茜·乔多罗、艾里斯·扬、莉丝·沃格尔等,主要理论内容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的代表人物艾里斯·扬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依赖父权制度而建立的,因而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女性与男性的等级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女性母职的意识形态宣传都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权制。“二元论”源于琳达·菲尔普斯所提的“父权资本主义”,指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境况源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相互区别同时又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代表人物有海蒂·哈特曼、齐拉·爱森斯坦、南茜·乔多罗。海蒂·哈特曼认为女性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

个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系统,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就已然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性别分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出了性别等级分工,并且通过家庭工资、意识形态等手段使二者之间的联系互相加深,因而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同时同这两种制度作斗争。齐拉·爱森斯坦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决定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核心要素。南茜·乔多罗则从妇女的母职与社会性别组织、母职的意识形态及其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相互联系。

准确来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产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女性主义遭遇了多重危机。首先,在现实方面,同性恋、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及第三世界妇女,她们用自身不同于主流妇女的独特女性经验使主流女性主义不得不质疑她们所使用的“妇女”“妇女经验”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普遍性,同时对妇女的暴力、对女性性行为、再生产的控制以及对女性工作和女性气质的贬低又呼吁女权主义运动的继续。其次,在理论方面,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后现代理论如狂风一般席卷了西方知识界,对原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再次,在时代背景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波助澜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进入了结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段,并成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作为一种流派不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只能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的一种独特话语,其内部各个代表人物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解以及与唯物主义的密切程度也各不相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多种理论综合的产物,它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理论、心理分析理论

等各种话语相结合的产物。”^{[2]7}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汀·德尔菲、唐娜·兰德里、格拉尔德·麦克林、罗斯玛丽·亨尼西。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深受后结构主义大师理论的影响,它解构一切,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主张话语即权力,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以及实行社会变革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不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生产与再生产、阶级等概念,把关注点聚焦在语言、文本、意识形态、国家和文化实践、身体的意义等上,主张用微观的、动态的、偶然的、多元化的视角解释当下女性的生存环境。唐娜·兰德里、格拉尔德·麦克林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实践的意识,是在世界中会产生物质后果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语言和文化产品的产生是“实践的意识”形式,是物质、生产性的活动。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过于重视文本、叙事、解释或者阅读世界,具有强烈的非政治性和去实践性。

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定

(一)理论实质:是一种西方左翼社会思潮

虽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但我们应看到其实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验截然不同的左翼社会思潮。女权主义作为类型庞杂的新社会运动中的一员,其与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大为不同,它使“人们在享受‘富裕社会’的同时感到自己的自由、自尊、自主等自我价值受到了威胁,新社会运动的抗议主题就是这些新威胁和新异化”^[3]。女权主义从性别的视角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理论视域,其分裂的、离散的和多元化的理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潜能,但同时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过于依赖文化分析而远离实际、回避阶级政治,因而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强有力批判的现实力量。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因而其实质是与西方左翼有着相近政治立场的比较激进的左翼社

会思潮。

(二)应用的基本方法:唯物主义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典范。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经济决定论作为立足点,通过对家务劳动的性质和价值的探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家务劳动是未付酬的生产性劳动,而资本主义通过把其归为非生产性劳动来剥削和压迫妇女,达拉·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则对此进行了深化,他们直接把妇女的家务劳动纳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之中,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与男性的社会劳动一样具有价值,而广大的家庭妇女却未被支付任何报酬。很显然,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女性被剥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屈从于男性的地位。

其次,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分析,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个因素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其基本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二者都把经济分析作为基本分析理论。“一元论”的代表人物艾里斯·扬在劳动性别分工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阐发了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这一单系统论,并且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看成是研究女性问题的基本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实现一种彻底的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代表人物哈特曼认为,父权制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结构上”^[4],通过这些男性阻止女性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源,并控制他们的性生活。米切莉·巴雷特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对于妇女受压迫的建构和再生产的作用,但是她同样认为,不能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关系分开来讨论女性受压迫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基础

上展开其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

再次,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妮·弗格森沿袭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把劳动性别分工作为其分析性行为、父母角色和社会纽带的基础,并通过分析妇女在性别劳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得出妇女是“革命”阶级的结论,虽然这种“革命”是意识的“革命”而非现实的“革命”。进入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时期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斯玛丽·亨尼西、唐娜·兰德里和杰拉尔德·麦克林。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罗斯玛丽·亨尼西坚持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话语的存在离不开由其组织和构成的物质基础,同时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兰德里和麦克林也认为“产生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处于物质实践中,具有物质效果,甚至还会影响经济基础结构。”^{[1]191} 并且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抛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开创的本质主义、规律性、宏大的理论体系,转而崇尚多元性、不稳定性、微观、偶然的研究视角。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了,但不可否认其仍然十分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一切还是得从具体的物质实际出发,尽管这其中还包含了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作用,因而其应用的仍然是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方法。

(三)价值旨归:实现女性解放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是由女性创立、为了实现女性解放、主要依靠女性实现、以女性为中心的理论和运动,其起点和落脚点、最终目标和价值旨归都是实现女性群体的解放。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女权主义的发展由领袖人物推动截然不同,它的每一次理论的飞跃、每一次实践的进步,都是由无数西方女性不懈的独立抗争与奋斗的结果,目的在于消除性别歧视,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屈从地位,实现女性全面和彻底的解放。虽然现阶段的唯物主义女性

主义因其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特征已经离开现实生产太远,已然丧失了改变女性生存状况的能力,但是我们仍不能否认其力图实现女性全面而彻底的解放的初衷。

三、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能正确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解放

(一)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基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而后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解构、颠覆甚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过分关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等基本观点。客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女性问题上固然存在着一些局限,但是不能因此就对其进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只要资本依然存在于世间,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必然要求其对广大国内外女性工人进行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女性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为深重,女性既受到男性父权制社会的集体压迫,还受到来自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程度变本加厉,阶级矛盾也更加突出,这种阶级矛盾不仅包含着发达国家资本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压迫,也包含有男性资本家对女性工人的阶级压迫。另外,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还造成了人性的分裂和异化,“资本关系以抽象的理性原则渗透到人类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成为统治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则。人类过上了有史以来最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人类成为物质生活的不停息的追逐者,人的感性生命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追逐物质的手段”^[5]。

因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并占统治地位,妇女就不可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因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女性依然遭受着巨大的阶级压迫,而只要存在着阶级压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解放就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在解决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问题上依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基础对于个人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在公共领域,社会主要按照财富多寡划分社会地位,而在私人领域,妇女地位也基本上取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实力。因而唯物史观所主张的从经济因素来分析女性问题仍然是考察和分析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的根本原则。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依然是改变妇女生存状况最有力的理论指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变革而忽视社会实践这一改变女性生存状况的根本性因素显然对女性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发展都毫无益处。

(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缺乏改变社会的现实力量

首先,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倾向。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思考女性问题,然而后期的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由于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后现代独特的思维方式,如批判现代性宏大的叙事方式,否认有涵盖一切的规模宏大的理论,反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二分法,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多元化,它怀疑一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它解构了一切宏大的话语体系,认为性别、阶级、种族的分类都过于概括,把“女人”“父权制”都看作是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反对男女二元,提倡多元的差异政治模式。它对“妇女”范畴进行了解构,提倡妇女主体的多样化,关注“话语的”性别、团体,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偶然的、局部的,瓦解了女性主义政治赖以存在的本体论的基础,

因而不可能把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等具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女性力量凝聚起来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实。

其次,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强烈的去实践性。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把关注点放在文本、话语权力、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及身体的意义等问题上,力争成为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主体,其理论具有强烈的经院色彩。然而,女性受压迫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它“不是一种叙事、一个文本或一种解释或阅读世界的方式”^[7]。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大势将助推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消亡

在整个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女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二者发展的高潮和低潮在许多时期都相近甚至相同,社会主义运动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常常起着助推作用。因而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前景的预测,也应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重点考虑进来。就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形势来看,首先,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体现。而且,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金融危机还在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发达国家霸权主义盛行,国际冲突不断,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进行反霸权斗争,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这些矛盾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根本缺陷,它始终只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里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必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其次,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来看,自苏东剧变以后,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但是当代世界历史仍处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程中。并且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

主义的力量正在复苏。中国、古巴、越南、老挝、朝鲜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新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外,苏东剧变以后坚持下来的共产党,经历了危机、重组、更新和发展,致力于谋求在本国政治舞台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作用。“身处21世纪这个伟大时代,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这个时代‘最实际的呼声’、时代的最强音和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21世纪是社会主义振兴的世纪!”^[8]

21世纪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西方左翼在文化中和实践上退守的状况会改变,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增强,对女性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威力会逐渐复归甚至更甚于从前。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之一,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生根发芽的同时又与父权制牢牢结合在一起的后现代理论,它不仅背离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主张,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相悖。因而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如果坚持走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之路,不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仅不能改变女性的受压迫状况,还将导致自身的穷途末路。

[参考文献]

[1] 秦美珠.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ROSEMARY HENNESSY, CHRYS INGRAHAM. Materialist feminism—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M]. New York:Rout-ledge, 1997.
 [3] 姜辉. 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228.
 [4] 詹尼特·A. 克莱尼. 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M]. 李燕,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77.
 [5] 秦美珠. 困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走向[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0.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7] 黄继锋. 唯物主义女权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2004(3):25.
 [8] 姜辉.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4.

Ideological Cours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Prospect of Feminist Marxism

ZHU Jin-j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Marxist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and materialist feminism. Although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theoretical claims, its essence is the same. It is a western left wing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which is alway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constructionist materialist feminism, as the latest stage of feminist Marxism, has deviated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doctrine and lacks the realistic power to change the society.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ing of world socialis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strong call for the return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materialist feminism will not correctly guide women’s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feminist Marxism; Marxist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materialist feminism

(责任编辑 鲁玉玲)